

中华译学馆·中华翻译研究文库

许 钧◎总主编

全球化背景下 翻译伦理模式研究

申连云◎著

非外借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中华译学馆·中华翻译研究文库

许 钧◎总主编

全球化背景下 翻译伦理模式研究

申连云◎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背景下翻译伦理模式研究 / 申连云 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 10

(中华翻译研究文库)

ISBN 978-7-308-18646-9

I. ①全… II. ①申… III. ①翻译学—伦理学—研究
IV. ①H059-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18589 号

真言類
館學譯華中

全球化背景下翻译伦理模式研究

申连云 著

出品人 鲁东明
总编辑 袁亚春
丛书策划 张琛 包灵灵
责任编辑 黄静芬
责任校对 田慧
封面设计 程晨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8.5

字数 234 千

版印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8-18646-9

定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ss.tmall.com>

中华译学馆立馆宗旨

以中华为根译与学并重
弘扬优秀文化促进中外交流
拓展精神疆域驱动思想创新

丁酉年冬月 许钧 撰 罗新 书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翻译伦理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研究”(17BYY059)

总 序

改革开放前后的一个时期,中国译界学人对翻译的思考大多基于对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数次翻译高潮的考量与探讨。简言之,主要是对佛学译介、西学东渐与文学译介的主体、活动及结果的探索。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文化转向,让我们不断拓展视野,对影响译介活动的诸要素及翻译之为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考察一国以往翻译之活动,必与该国的文化语境、民族兴亡和社会发展等诸维度相联系。三十多年来,国内译学界对清末民初的西学东渐与“五四”前后的文学译介的研究已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但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中西古今关系发生了变化,其态势从总体上看,可以说与“五四”前后的情形完全相反:中西古今关系之变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根本性的变化。在民族复兴的语境中,新世纪的中西关系,出现了以“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诉求中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输出为特征的新态势;而古今之变,则在民族复兴的语境中对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化传统与精华有了新的认识,完全不同于“五四”前后与“旧世界”和文化传

统的彻底决裂与革命。于是,就我们译学界而言,对翻译的思考语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对翻译思考的路径和维度也不可能不发生变化。

变化之一,涉及中西,便是由西学东渐转向中国文化“走出去”,呈东学西传之趋势。变化之二,涉及古今,便是从与“旧世界”的根本决裂转向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价值观的重新认识与发扬。这两个根本性的转变给译学界提出了新的大问题:翻译在此转变中应承担怎样的责任?翻译在此转变中如何定位?翻译研究者应持有怎样的翻译观念?以研究“外译中”翻译历史与活动为基础的中国译学研究是否要与时俱进,把目光投向“中译外”的活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要向世界展示的是什么样的“中国文化”?当中国一改“五四”前后的“革命”与“决裂”态势,将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在世界各地创建孔子学院、推广中国文化之时,“翻译什么”与“如何翻译”这双重之问也是我们译学界必须思考与回答的。

综观中华文化发展史,翻译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一如季羨林先生所言,“中华文化之所以能永葆青春”,“翻译之为用大矣哉”。翻译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语言价值、创造价值和历史价值在中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表现尤为突出。从文化角度来考察翻译,我们可以看到,翻译活动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其形式与内涵在不断丰富,且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相联系,这种联系不是被动的联系,而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一种建构性的力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是推动世界文化发展的一种重大力量,我们应站在跨文化交流的高度

对翻译活动进行思考,以维护文化多样性为目标来考察翻译活动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创造性。

基于这样的认识,也基于对翻译的重新定位和思考,浙江大学于2018年正式设立了“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旨在“传承文化之脉,发挥翻译之用,促进中外交流,拓展思想疆域,驱动思想创新”。中华译学馆的任务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在译的层面,推出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译丛,“译人”与“译出”互动,积极参与国家战略性的出版工程;在学的层面,就翻译活动所涉及的重大问题展开思考与探索,出版系列翻译研究丛书,举办翻译学术会议;在中外文化交流层面,举办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翻译家论坛,思想家、作家与翻译家对话等,以翻译与文学为核心开展系列活动。正是在这样的发展思路下,我们与浙江大学出版社合作,集合全国译学界的力量,推出具有学术性与开拓性的“中华翻译研究文库”。

积累与创新是学问之道,也将是本文库坚持的发展路径。本文库为开放性文库,不拘形式,以思想性与学术性为其衡量标准。我们对专著和论文(集)的遴选原则主要有四:一是研究的独创性,要有新意和价值,对整体翻译研究或翻译研究的某个领域有深入的思考,有自己的学术洞见;二是研究的系统性,围绕某一研究话题或领域,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合理的研究方法、有说服力的研究结论以及较大的后续研究空间;三是研究的社会性,鼓励密切关注社会现实的选题与研究,如中国文学与文化“走出去”研究、语言服务行业与译者的职业发展研究、中国典籍对外译介与影响研究、翻译教育改革研究等;

四是研究的(跨)学科性,鼓励深入系统地探索翻译学领域的任一分支领域,如元翻译理论研究、翻译史研究、翻译批评研究、翻译教学研究、翻译技术研究等,同时鼓励从跨学科视角探索翻译的规律与奥秘。

青年学者是学科发展的希望,我们特别欢迎青年翻译学者向本文库积极投稿,我们将及时遴选有价值的著作予以出版,集中展现青年学者的学术面貌。在青年学者和资深学者的共同支持下,我们有信心把“中华翻译研究文库”打造成翻译研究领域的精品丛书。

许 钧

2018 年春

目 录

导 言	001
第一章 翻译伦理研究的繁华景观	015
第一节 异军突起:国内翻译伦理研究现状述评	016
第二节 众声喧哗:国外翻译伦理研究现状述评	030
第二章 全球化文化状况:人生意义的丧失与寻求	077
第一节 生长的沙漠:人生意义的丧失	078
第二节 意义在别处:他者伦理学的意蕴	096
第三章 “利他”:一个翻译伦理新模式	118
第一节 翻译伦理学的作为	119
第二节 怎么译:从“操控改写”到“克己利他”	129
第三节 “利他”的用心	150
第四章 “利他”:新的精神自由状态	174
第一节 傲慢与偏见:翻译目的论批判	175
第二节 翻译与人生	199

第五章 “想到上帝的虚己”:德里达的寄望	223
第一节 译者的任务:德里达对话本雅明	223
第二节 翻译与好客:德里达的深情	237
第三节 翻译的神学:德里达的深意	248
结 语	262
参考文献	265
索 引	283

导 言

20 世纪 90 年代,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宣布“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出现了各种各样跨越国界的流动,如资金、技术、货物、人员、服务、资讯流动等。学术上把这种跨越国界的流动称为“去领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也就是全球化、一体化。在这种席卷全球的一体化浪潮中,据说有一种东西是不受影响,甚至是反向而动的,那就是文化。张宝珍是这么说的:

不加定语的全球化是不准确的,因为只有经济和科技全球化是一种现实趋势。其他如文化、宗教、政治制度、生活方式等虽有相互影响和吸收,但不可能实现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伴随着文化的多元化……文化多元化是当代文化全球化中的重要标志和主要形态。^①

这肯定代表了一派人的观点。但还有另一派意见,他们不仅认为文化正在经历全球化进程,而且认为文化处于全球变化或转型的中心地位。汤姆林森(John Tomlinson)是这么说的:

我们的时代所经历的巨大转型(即全球化,本书作者注)

^① 张宝珍. 经济全球化需要研究的十大问题. 世界经济,1998(9):27.

所改变的恰恰就是文化体验的结构,它的的确确影响了我们的感觉。^①

长期以来,文化作为一定语境中的适应性策略和意义建构,总是跟特殊性和地方性联系在一起的;但如今,据汤姆林森观察,“全球联结的增强”和“时空的压缩”正在改变文化这种意义与地点结合的概念方式。他认为这也不是什么坏事;与对同质化和霸权文化感到担心相反,他乐意看到文化之间差异和距离的消失。他认为,在克服有形的地理距离之后,文化距离的克服是衡量全球化成就的一个标准。因为“文化的差异是偶然的而非必然的联系”,“文化的职能并不仅仅是差异的确立”,文化之间的差异“并非起于文化实践的目的,而不过是它的后果罢了”;“文化没有在根本上与差异结合在一起,文化也不是普遍概念本身的对立面。人类可能存在着某种共同的、潜在的存在状况(生活方式),它对这个星球上的所有人都适用,在此基础上可能还有某种普遍的价值观”。“甚至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人类利益的某些普遍的感受,在全球的现代性的地方认同感的再植入中,是内在所固有的。”^②

我完全不能认同或接受汤姆林森对文化所抱有的这种普遍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也感受不到他对全球文化或霸权文化所抱有的乐观态度和好感,但我承认世界文化正在经历全球一体化这一现实。而且我认为,这一现实远比我们想象的严重。承认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对文化同质化的拥抱;相反,拒绝接受这一事实反而是文化多样化的最大危险。经济或政治的全球化并不必然意味着文化的多样化或地方化。地方化作为对全球化的抵制,正好反映了全球化这一残酷现实;没有文化的全球化、一体化,怎么会有对

① 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郭英剑,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

② 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郭英剑,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98.

全球化、一体化的抵抗?! 有关文化全球化的残酷现实,只要想想英语作为世界语言的霸权导致众多地方语言消亡的情况就一清二楚了。语言消亡的速度是触目惊心的;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在2002年发表的题为“多语化与文化的多样性”的演讲中提到,每两个星期就会有一种语言从世界上消失。^① 如果继续按照这种速度和趋势发展,我们很快就要进入前巴别塔时代了。

文化全球化显著体现在英语的霸权和地方语言的消亡之中。如果真正存在着文化全球化的现象,那么它自然表现为生活方式的全球化。表面上看,人们恪守着各自古老的传统。但其实,人们的心灵越来越空虚,精神越来越贫乏,所谓“穷得只剩下钱了”。在这贫乏、空虚和狭隘的心灵里充斥的是自我,而没有他人的位置;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一切以自我为尺度。对于人性的全面危机,弗罗姆(Erich Fromm)说我们已经从“超人”变成了“非人”^②。从对神秘的自然秩序充满惊讶和敬畏感、与自然融为一体并和谐相处的正常人,变成了凌驾于世界之上、狂妄地要为整个宇宙万象立法的“超人”;如今又从自以为无所不能的世界主宰,变成了没有灵魂、没有操守、受制于欲望和制度的“非人”。此中情形,正如弗罗姆所说:“自福音书问世以来,世界一直是按照魔鬼(撒旦)的法则发展的。”^③

“魔鬼的法则”指的当然就是资本的法则。据弗罗姆观察,18世纪资本主义逐渐发生了一种深刻变化:经济行为与伦理学、经济行为与人的价值观念逐渐分离开来,经济活动被视为一个自主的整体,它不受人的需要和人的意志制约;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有着

① 加利. 多语化与文化的多样性——在接受南京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仪式上的演讲.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2(3):8.

② 弗罗姆. 占有还是生存——一个新社会的精神基础. 关山,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5.

③ 弗罗姆. 占有还是生存——一个新社会的精神基础. 关山,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63.

自己动力和规律的运动着的系统。于是,决定经济系统发展的问题不再是什么对人有益,而是是什么对经济系统的增长有益。资本主义制度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必须鼓励人的这种性格特征的发展。^①

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物欲膨胀等特征并不是自然的人性或人的本能,而是资本主义社会条件的产物。如今,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和经济制度已然几乎覆盖全球,西方启蒙运动之后逐渐形成的以释放和广播物质贪欲、放弃和削弱精神的超越向度为特征的现代性规划正在全球得以实施;但这正是西方长期以来致力于把非西方文明纳入自身体系的结果,是历史的偶然发展而已,并不是人类的必然命运或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鲍曼(Zygmunt Bauman)把这种全球化现状和人性的这种普遍恶化看成欧洲“园艺文化”对世界各地“荒野文化”进行血腥铲除的结果。^②

无论如何,当今世界已然成为一个具有整体性和内驱力的全球经济结构,个人乃至单个国家在资本逻辑的裹挟下不由自主地走向深渊。面对全球一体的庞大的经济系统,我们可能无能为力;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要是改变不了世界,就先改变世界观吧,也许世界因此而改变;因为毕竟一切罪恶的根源不在经济系统,而在人。应该从根本上改变人的心灵、意识,这应该成为一种共识。1993年,美国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会议上发表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Declaration Toward a Global Ethic)坚称:“除非我们在个人和公众的生活中达到一种意识上的改变,否则世界不可能变得更好。”弗罗姆也宣称:“在人类

① 弗罗姆. 占有还是生存——一个新社会的精神基础. 关山,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9.

② 鲍曼. 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 洪涛,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67.

历史上首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人类肉体上的生存取决于人能否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心灵。”^①

改变自己的心灵或意识,从自我的物质欲望中走出来,从自我的目的、意图、计划、期待的狭隘局限中走出来,让充斥着自我和物质贪欲的心灵得到解放,让充斥着自我的心灵为他人腾出位置和空间,直接、真诚、无比空灵地面对他人,泯忘物我界线,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总之,从坚持主体性原则、以自我为尺度对他人进行框限和宰制的“操控论”向坚持利他性原则、尊重他人价值的“利他论”发生转变。

操控论是当前翻译研究中的主导话语、强势话语,也是翻译实践中普遍奉行的原则,以翻译目的论为典型代表,异化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及包括食人主义翻译理论在内的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都不能幸免。这些翻译理论的共同点是主张改写、操控原文来实现自身的目的或完成自身的政治议程(political agenda);且不管这些政治议程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但把自己的目的强加于原文之上,以自己的目的和好恶来对原文进行取舍的为所欲为的做法,导致的都只能是某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极权主义。相反,放弃自己的目的和需要,放弃自己的宰制和操控,向原文的各种可能性开放,让原文原原本本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直接参与到对原文的意义或真理的讨论中来,反对独白,坚持对话,这种民主的立场才是世界和平的希望,未来的希望。

当前,国内外有关翻译伦理模式的讨论多谈翻译策略、行为规范等,却很少特别关注道德彻底改变自然生命存在的气质和品格的一面。我所提倡的“利他性”伦理可以落实到具体的翻译方法、

① 弗罗姆. 占有还是生存——一个新社会的精神基础. 关山,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2.

翻译策略上,但这不是本书的重点,本书的目的——也是翻译伦理学的最终目的——是实践性地影响译者和读者的内在生命品质。这种做法将从以“退出自身”为意蕴的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他者伦理学中得到有力支撑,也从“向里用力”的中华伦理文化中获得充分印证。

与以上对德性伦理的强调相关的是,我把翻译伦理模式和生活伦理模式结合起来,或者说,把翻译模式放到生活模式中去考量,放到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中去考量。我认为,一个翻译伦理模式应该解决的不仅是“怎么译”的问题,还是“怎么活”的问题。

如果让翻译研究回归生活世界,那么“忠实”标准就应该得到维护,因为它是翻译实践或翻译生活中普遍认可的价值。“忠实”之所以被解构,是因为以往的“忠实”还不够忠实,是因为在实践中译者往往以忠实之名,行操控之实。对“忠实”的解构其实是对翻译中所蕴含的操控逻辑和权力运作结构的解构,所追求的反而是更严格的忠实。

由此看来,利他性伦理不是无所作为的消极状态,而是忠实翻译的积极可能性,也是人生在世的积极可能性。读者的最大利益无须由译者来决定,而只能由读者自己来决定。

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物欲膨胀,道德滑坡,意义丧失,这种人性的堕落和危机是当今全球化社会面临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如果说生活中人们普遍把通过对物(以及他人)的攫取、掠夺、利用、占有、消费以最大限度满足自己的欲望当作人生的主要甚至唯一意义,那么这一特征反映在翻译中,就是把通过对原文的改写、操控、挪用、盗用以实现自身目的的做法看作翻译的主要甚至唯一意义。这是狭隘的人生观和翻译观。人是有限的存在,也是理性的存在;人生的意义和翻译的意义在于对自身有限性的克服和超越,而不在于对自身有限性的坚持和维护。克服自私自利之心而